

多子是否多福？*

——子女数量对中国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

张亚蕊^{1,2,3}, 陈天勇^{1,2}, 韩布新^{1,2}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49;

3. 阿坝师范学院, 汶川 623002)

摘要: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定量分析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子女情感支持对两者关系的中介作用。基准Probit回归结果表明,子女数量显著正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运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影响不存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子女情感支持可完全中介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抑郁情绪受子女关系质量(情感支持)而非子女数量的影响,子女数量增多可能导致责任分散效应;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时代背景下,应发扬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鼓励子女常回家看看,给予老年人更多的陪伴和情感支持。

关键词:子女数量;情感支持;老年人;抑郁情绪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4)02-0128-06

1 引言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快速而激烈的老龄化过程,《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是2.8亿,占总人口的19.8%(民政部,2022)。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以抑郁为代表的情绪障碍已成为我国老年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Liu et al., 2020)。研究发现,尽管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整体抑郁症年龄标准发病率有所下降,但老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Bai et al., 2022)。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严重影响其晚年生活质量。因此,探究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和解决机制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

“多子多福”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近年来又重新成为社会人口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较少。在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背景下,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刘亚飞,胡静,2016;刘生龙等,2020)。研究表明,拥有更多子女的老年人晚年生活更有保障(Xia et al., 2022)。但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子女数量对于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和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影响(慈勤英,宁雯雯,2013)。近

期研究甚至发现“多子少福”现象(子女数越多,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越多),并且在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老年人中尤其明显(杨华磊等,2021;郝鑫等,2024)。

基于横断面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因果关系难度极大,主要障碍是内生性问题。子女数量可能受到一些混淆因素的影响,如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初孕年龄、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等(Hayford & Morgan, 2008),且这些因素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也有一定影响(Aitken et al., 2016)。工具变量作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最常见的方法,因其简洁、高效的特点逐渐受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者的青睐(蔡万象,李培凯,2021;陈云松,2012)。

纵观已有研究,虽然使用工具变量能解决内生性问题,但是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分歧,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人群中具有显著的文化差异(Antczak et al., 2023)。有研究基于欧洲健康与养老调查数据(SHARE),利用欧洲人子女双全的生育偏好,使用头两胎性别是否相同作为工具变量分析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关系,结果发现额外生育的孩子对欧洲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没有显著影响(Kruk & Reinhold, 2014)。Vu等

*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0YFC2003000)。

通信作者:陈天勇, E-mail:chentianyong@psych.ac.cn。

(2021)基于2011年越南老龄化调查数据(VNAS),利用越南的“二胎”计划生育政策选取相应的工具变量也得到类似结论。但van den Broek(2020)基于2011年和2015年美国健康与老龄化趋势调查数据(NHATS)的研究发现,额外生育的孩子可以显著降低65岁及以上美国白人母亲晚年抑郁的风险。国内也有学者使用工具变量法探究子女数量与老年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研究多聚焦子女数量对老年父母身体健康或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刘亚飞,胡静,2016;刘生龙等,2020),目前尚未检索到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子女数量和中国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关系进行因果推断的实证研究。

多子是否多福的关键在于子女数量的增多是否带来子女支持的增多。有研究发现,子女数量没有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关键词是子女支持质量(王碧涵,2023)。随着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体系的健全,中国老年人对子女情感支持的需求已超越经济支持和生活支持,更注重情感联系和亲情交流(Wang et al., 2022),子女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李嘉楠,陈荣杰,2022)。但以往研究多关注子女数量或子女支持因素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单独影响,较少关注子女支持质量在子女数量与老年抑郁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以往国内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增多会提高老年人的抑郁风险(杨华磊等,2021;赫鑫等,2024),即出现“多子少福”现象,该结论与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明显相悖;赫鑫等(2024)认为“多子少福”现象可能跟责任分散效应有关,但仍缺乏相关证据的支持。因此,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本研究首先采用IV-Probit回归定量分析“多子少福”现象(子女数越多,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越多)是否真的存在;随后,将子女情感支持的均值作为中介变量,采用路径分析模型进一步探讨“多子少福”现象是否源于责任分散效应(子女数越多,子女平均情感支持反而减少)。

2 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8年数据,该数据覆盖全国28个省、150个地区、450个村镇/城市,涉及10257个家庭中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17708人。由于工具变量

是前两胎的性别结构,因此,研究选取60岁以上至少有两个亲生子女的老年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之后最终保留样本4775个。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选取抑郁得分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CHARLS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简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0)测量受访者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该量表由10个条目(如“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感到情绪低落”以及“我感到害怕”等)组成,包括8个正向条目和2个反向条目。受访者被要求根据他们前一周的感受和行为对十个问题进行评分。对反向条目下的回答进行反向赋值,将得分加总得到个体抑郁得分。总分在10~40分之间,分数越高抑郁状况越严重。基于CHARLS的研究已经证实,CES-D-10可以有效地测量中国老年人群的抑郁水平(黄庆波等,2015)。当前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

2.2.2 解释变量

采用子女数量这一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子女数量为父母已生育的孩子数量,问卷中会循环提问受访者“您第几个孩子的性别是?”在此问题基础上进行转换后加总得到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2.2.3 中介变量

采用子女情感支持这一指标作为中介变量。老年人被要求评价每个子女的“探望频率”,由于研究重点考察子女数量和子女支持质量的共同作用,故将每个子女的平均探望频率作为子女情感支持得分,分值越大代表老年人获得每位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

2.3 IV-Probit回归模型设定

在模型设定上,参照以往研究(Andresen et al., 1994; Zhou et al., 2021),将CES-D10得分 ≥ 20 认定为有抑郁情绪(赋值为1),CES-D10得分 < 20 认定为无抑郁情绪(赋值为0),从而生成抑郁得分的二分类变量。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来避免基准Probit回归估计结果可能出现的偏差。

以往研究基于人们对儿女双全的生育偏好,多采用前两胎性别是否相同作为工具变量(Gao & Qu, 2019; Hu et al., 2021; van den Broek, 2021)。由于中国人有更强烈的男孩生育偏好,研究选取前两胎是否有男孩作为工具变量(Chen & Lei, 2009),基

于 IV-Probit 模型定量分析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由于男孩偏好,前两胎无男孩的父母更有可能生育第三胎。前两胎是否有男孩与子女数量高度相关,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的前提。此外,前两胎是否有男孩是自然分配的结果,只能通过子女数量来影响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较少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本文的回归模型为:

$$X_i = \alpha_0 + \alpha_1 Z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在第一阶段,使用外生工具 Z (样本 i 的前两胎是否有男孩) 预测样本 i 的子女数量 X 。 α_1 表示前两胎有男孩的老年人与前两胎无男孩的老年人之间子女数量的差异,这种外生的生育差异在第二阶段回归中被用来估计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因

果影响。

$$\Pr(Y_i = 1) = \phi(\beta_0 + \beta_1 \hat{X}_i + \mu_i) \quad (2)$$

在第二阶段,老年人 i 的抑郁情绪状况 Y 对 \hat{X} 进行回归, \hat{X} 为第一阶段回归的子女数量预测值。

3 结果

3.1 内生性检验

将老年人的子女数量和抑郁情绪按前两胎是否有男孩进行分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老年人平均有 3.08 个孩子,与以往研究一致 (Chen & Lei, 2009)。由于男孩生育偏好,前两胎无男孩的老年人要比前两胎有男孩的老年人多生 0.54 个孩子,前两胎无男孩的老年人抑郁情绪检出率低于前两胎有男孩的老年人 (40.2% vs 43.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	总样本	前两胎无男孩		前两胎有男孩	
	$M \pm SD/\%$	n	$M \pm SD/\%$	n	$M \pm SD/\%$
子女数量	3.08 ± 1.86	1145	3.85 ± 1.58	3630	3.31 ± 1.41
抑郁情绪 (CES-D ≥ 20)	42.40%	460	40.2%	1566	43.1%
年龄	69.61 ± 6.70	1166	69.53 ± 6.63	3734	69.63 ± 6.76

表 2 对比了基准 Probit 回归与 IV-Probit 回归的结果。基准 Probit 回归结果表明,子女数量能显著预测老年人的抑郁情绪 ($\beta = 0.07, p < 0.001$); 运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影响不存在 ($\beta = -0.14, p = 0.084$)。第一阶段 Cragg - Donald

Wald F 统计值为 117.25 (> 10), 借鉴已有研究 (袁微, 2018), 进一步的 Weakiv 检验结果显示, AR、Wald chi2(1) 值分别为 3.15、2.99, 均在 10% 水平上统计显著, 提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模型外生性问题。

表 2 基准回归与 IV-Probit 回归结果 (CHARLS 2018)

变量	Probit 回归		IV-Probit 回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子女数量	0.07***	0.01			-0.14	0.08
头两胎有男孩			-0.53***	0.05		
Constant	-0.42***	0.05	3.85***	0.04	-0.30	0.29

3.2 稳健性检验

使用 CHARLS 2011 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3 中的基准 Probit 回归结果支持子女数量能显著正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情绪 ($\beta = 0.08, p < 0.001$); 运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影响不存在

($\beta = -0.04, p > 0.05$)。第一阶段 F 值为 177.74 (> 10), Wald 值为 3.94, 在 5% 水平上统计上显著, 提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模型外生性问题。该结果与 2018 年的分析结果较为一致, 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基准回归与 IV-Probit 回归结果 (CHARLS 2011)

变量	Probit 回归		IV-Probit 回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子女数量	0.07***	0.01			-0.05	0.06
头两胎有男孩			-0.51***	0.04		
Constant	-0.44***	0.03	4.00***	0.34	0.00	0.23

3.3 中介效应分析

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表明,子女数量与情感支持负相关显著($r =$

-0.14^{***})、情感支持与抑郁情绪负相关显著($r = -0.11^{**}$),子女数量与抑郁情绪正相关显著($r = 0.09^{***}$)。

表4 变量的描述和相关分析($n=4775$)

变量	$M \pm SD$	子女数量	子女情感支持	抑郁情绪
子女数量	3.44 ± 1.47	1		
子女情感支持	5.30 ± 2.05	-0.14^{***}	1	
抑郁情绪	19.37 ± 6.73	0.09^{***}	-0.11^{**}	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1$

使用 SPSS 26 及其宏程序 PROCESS 进行分析。研究中采用非参数百分位的 Bootstrap 法抽样 5000 次,置信区间为 95%。以子女数量为自变量、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为因变量,子女的情感支持为中介变量,控制年龄、性别、户籍类型、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等社会人口学变量后,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模型拟合良好(表 5)。子女数量显著负向预测情感支持($\beta = -0.20, p < 0.001$),子女情感支持显著负向预测抑郁情绪($\beta = -0.31, p < 0.001$),子女数量对抑郁情绪预测作用不显著($\beta = 0.16, p = 0.051$)。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情感支持在子女数量和抑郁情绪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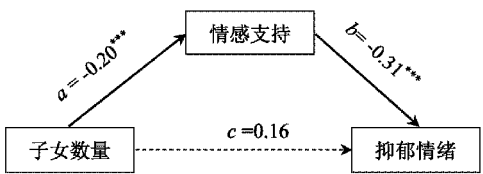


图1 子女情感支持在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图

表5 子女数量与抑郁情绪的中介效应分析($n=4775$)

路径	Effect	SE	95% CI
子女数量→抑郁情绪	0.16	0.08	$-0.01 \sim 0.33$
子女数量→情感支持→抑郁情绪	0.06	0.01	$0.04 \sim 0.09$
总效应	0.22	0.08	$0.06 \sim 0.39$

4 讨论

基于 CHARLS 项目 2018 年数据,选取头两胎是否有男孩作为工具变量,采用 IV - Probit 模型定量分析子女数量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基准 Probit 回归结果表明,子女数量显著正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此前基于 CHALRS 和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的研究发现,子女数量显著正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杨华磊等,2021;赫鑫等,2024)。据此研究者可能会认为

子女数量对父母晚年的心理健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出现“多子少福”的结论。

然而,运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消失。研究结果提示“多子少福”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象,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与欧洲和越南的同类研究结果一致(Kruk & Reinhold,2014;Vu & Phung,2021)。但基于 NHATS 项目 2011 年和 2018 年数据的研究却发现,额外生育的孩子可以显著降低 65 岁及以上美国白人母亲晚年抑郁的风险(van den Broek, 2021)。由此可以发现,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显著的文化和人种差异(Antczak et al. ,2023)。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子女的情感支持可以完全中介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的正向预测关系,并且子女数量显著负向预测子女情感支持。研究结果提示“多子少福”这一假象可能与责任分散效应有关(武中哲,刘儒,2022)。即子女数量越多,每个子女对父母的陪伴和探望反而减少,因而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Bao,2021)。郝鑫等(2024)在讨论部分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但该研究对子女情感支持采用加总的计分方式存在明显问题,即加总后的子女情感支持得分必然与子女数量呈现正向关联(路径系数高达 0.71),不支持责任分散效应。不同的是,本研究选取所有子女情感支持的平均分代表子女情感支持,结果发现子女数越多,子女情感支持越低的现象,为责任分散效应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

综上所述,“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当前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具体来说,中国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主要受与子女关系质量(情感支持)而非子女数量的影响。该发现与现代化理论相符,即日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弱化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父母对子女情感支持的需求越来越突出

(Wang et al., 2022)。更多研究结果也支持子女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如与经济支持相比,与孩子见面频率更高的老年人更容易获得精神慰藉,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许新鹏,2017);春节期间的家庭陪伴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的精神空虚,降低老年人的自杀率(Fang et al., 2023)。

5 结论

研究结果提示:子女数量不直接影响中国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但子女数量增多可能导致责任分散效应,即老年人获得的情感支持相对减少,从而出现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抑郁情绪也越多的现象。研究结果强调子女情感支持而非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重要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应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孝道文化,鼓励子女常回家看看,给予老年人更多的陪伴和情感支持。

参考文献

- 蔡万象,李培凯.(2021). 管理学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及其解决策略:工具变量的应用.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38(2), 6-22.
- 陈云松.(2012). 逻辑、想象和诠释:工具变量在社会科学因果推断中的应用. *社会学研究*, 27(6), 192-216, 245-246.
- 慈勤英,宁雯雯.(2013). 多子未必多福:基于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定量分析.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0(4), 69-74.
- 黄庆波,王晓华,陈功.(2015). 10项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在中国中老年人中的信效度.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3(7), 1036-1041.
- 郝鑫,李荣超,甘甜.(2024). 为何“多子未必多福”?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 *应用心理学*, 30(2), 149-157.
- 李嘉楠,陈荣杰.(2022). 女儿数量、情感支持与老年父母健康:来自 CHARLS 的证据. *中国经济问题*, 4, 170-183.
- 刘生龙,胡鞍钢,张晓明.(2020). 多子多福? 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 8, 69-84.
- 刘亚飞,胡静.(2016). 多子一定多福吗:子女数量与母亲健康. *南方人口*, 31(6), 69-78.
- 民政部.(2022) 2022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24-01-13 取自 <https://www.mca.gov.cn/n156/n2679/c1662004999979995221/attr/306352.pdf>.
- 王碧涵.(2023). 子女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
- 武中哲,刘儒.(2022). 家庭权力结构变迁与农村失能老人赡养. *民间法*, 30(2), 141-153.
- 许新鹏.(2017). 代际支持、身心健康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社会工作与管理*, 17(2), 17-25.
- 杨华磊,吴远洋,张思清,张硕.(2021). 生育数量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人口研究*, 45(2), 47-60.
- 袁微.(2018). 二值选择模型内生性检验方法、步骤及 Stata 应用. *统计与决策*, 34(6), 15-20.
- 张海峰,林细细,张铭洪.(2018). 子女规模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互相卸责 or 竞相示范. *人口与经济*, (4), 21-33.
- Andresen, E. M., Malmgren, J. A., Carter, W. B., & Patrick, D. L. (1994).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in well older adults: Evaluation of a short form of the CES-D.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0(2), 77-84.
- Antczak, R., Quashie, N. T., Mair, C. A., & Arpino, B. (2023). Less is (often) mor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in 24 countri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8(11), 1892-1902.
- Aitken, Z., Hewitt, B., Keogh, L., LaMontagne, A. D., Bentley, R., & Kavanagh, A. M. (2016). Young maternal age at first birth and mental health later in life: Does the association vary by birth cohor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57, 9-17.
- Bai, R., Dong, W., Peng, Q., & Bai, Z. (2022). Trends in depression incidence in China, 1990-2019.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96, 291-297.
- Bao, L. (2021). Children's relative living proxim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 in China. *Research on Aging*, 44(3-4), 241-253.
- Chen, G., & Lei, X. (2009). "Fertility effect" or "supporting effect?"—quantity of children and parental health.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4(4), 601-616.
- Fang, H., Lei, Z., Lin, L., Zhang, P., & Zhou, M. (2023). Family companionship and elderly suicide: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2, 103055.
- Gao, Y., & Qu, Z. (2019). "More children, more happiness?": New evidence from elderly parents in China. GLO Discussion Paper, No. 366,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 Essen.
- Hayford, S. R., & Morgan, S. P. (2008). Religiosity and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le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Social Forces*, 86(3), 1163-1188.
- Hu, Z., Wu, Y., Yang, H., Xie, L., Zhang, A., Lin, X., Nie, Y., & Zhang, X. (2021). Effects of fertility behaviors on depression among the elderl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8, 570832.
- Kruk, K. E., & Reinhold, S. (2014). The effect of children on depression in old ag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00, 1-11.
- Liu, D., Xi, J., Hall, B. J., Fu, M., Zhang, B., Guo, J., &

- Feng, X. (2020). Attitudes toward aging,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Difference by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4, 85 – 92.
- Van den Broek, T. (2021). Is having more children beneficial for mothers' mental health in later life? causal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aging trends study. *Aging & Mental Health*, 25(10), 1950 – 1958.
- Vu, L. H., & Phung, T. D. (2021). The effect of child quantity and education on parents' well – being in Vietnam.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9, 706279.
- Wang, C., Liu, Z., Chen, T., Wang, J., Zhang, X., & Han, B. (2022).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old ag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na.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0, 1007408.
- Xia, W., van Wijngaarden, J. D. H., Huijsman, R., & Buljac – Samardžić, M. (2022). Effect of receiving financial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on depression among older person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19), 12974.
- Zhou, L., Ma, X., & Wang, W. (202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older adults: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81, 454 – 458.

More Children, More Blessings?

Th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Depression in the Chinese Elderly

Zhang Yarui^{1,2,3}, Chen Tianyong^{1,2}, Han Buxin^{1,2}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3. Aba Teachers University, Wenchuan 623002)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 in 2018, the IV – Probit model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benchmark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mber of childre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s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After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address endogeneity issues, this effect does not exist. 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emotion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can fu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depressive mood of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is influenc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child relationships (emotional support) rather tha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may lead to a dispersion of responsibility effe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interweaving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fewer children, we should promote China's excellent filial piety culture, encourage children to go home frequently and provide more companionship and emotional support to the elderly.

Key words: number of children; emotional support; elderly; depression